

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行为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onduct

陈国阶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 成都 610041)

当前社会行为、社会决策、社会过程与可持续发展的相悖性,必须予以高度的重视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已得到全国上下比较一致的认可,并已作为宏观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和政府决策思维的重要支柱,逐步贯彻。与此同时,对于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所遇到的难点,即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悖的资源问题、人口问题、环境问题、也有比较一致的清醒的认识。就是说,对在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必定会遇到的资源相对贫乏而又严重浪费的挑战,人口众多而素质比较低下的挑战,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严重挑战等,认识上已有一定警觉。

但是,可持续发展是一项综合、系统的长远战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除了要注意上述的资源、人口、环境问题的制约之外,还需要强有力的社会支撑和社会调控能力。就是说,在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不仅遇到资源、人口、环境问题的挑战,而且遇到社会行为过程、决策过程、调控过程脱离可持续发展轨道的挑战。后一问题的突出和尖锐,不亚于前者。并且,后者的问题与前者的问题绞结在一起,起着恶化前者的作用。至今,对于我国广泛存在的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行为、社会决策和社会过程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更确切地说,人们虽然注意到这些方面的问题,但由于政治的敏感性和社会的敏感性,人们有意回避这个问题或不愿深入讨论这个问题。笔者认为,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则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很难真正实施。只有我们对于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行为、决策和过程有较清醒的认识,并下决心加以纠正,使之纳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才是真正可实践、可操作的,前景才是光明的。当然,扭转、纠正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行为、决策过程需要作长期的努力,但这是不能回避的。从现在起,就应该有所认

识,有所作为。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理性的自觉的过程,不是一个放任自然的过程

我们为什么要重视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社会行为和决策行为呢?这是由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性质和基本要求所决定的。

首先,可持续发展是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有序行为。从其构成来说,经济、社会是其重要的组成成分,社会是这个复合系统中的灵魂。这里,自然是基础,经济是桥梁,社会是上层建筑,是发展和感应的主体。自然(包含资源和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环境条件,有了它,才有经济发展的可能;经济是对自然的开发和反馈;而经济发展的目标是社会满足,社会发展是持续发展的归宿。反过来,社会指导着经济开发,指导着对自然的态度。因此,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社会行为、决策和过程既是可持续发展过程,又是其归宿,离开社会行为、过程和决策,可持续发展就失去体现、运作的载体,也失去方向和目标。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自觉的过程,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也就是说,可持续发展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它不是自然过程的必然结果,也不是人类经济、社会行为和过程唯一的利益选择。实际上,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不论是农业社会还是近、现代工业社会,人类社会行为及其利益选择和价值取向,许多是与可持续发展背道而驰或不吻合的。即使在现代,人类对于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战略决策、社会行为、社会发展模式等的选择,也是千变万化、多种价值取向并存的,真正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并不多见。当代,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集团和阶层受不同利益的驱动,其选择的发展战略、社会行为、决策偏好,是很不相同的,许多是与持续发展相悖的。因此,放任不同社会利益集团对“发展”和资源开发的“自然”、“自由”选择,就不可能形成维护可持续发展的自觉行为,人

类亦将无法到达可持续发展的彼岸。人类到了今天这个发展阶段,人—地矛盾已处于极紧张状态,已不容许破坏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社会、经济行为肆无忌惮地继续下去。因此,人类必须选择与自然、环境、生态协调的新发展战略,并形成全人类较一致的共识,变成人类自觉制定、规范、实施的社会行动,即从单纯追求不同社会集团自身最大利益和消费满足的“自由”、“自然”选择,变成人类共同遵守的、为着人类共同未来而自我规范、约束、克制、合理发展、适度消费的自觉过程,持续发展的目标才能实现。

社会行为(包括决策等)既是一种物质运动过程(如社会消费等),又是一种意识、观念和思维过程,特别表现在社会发展规划、计划、战略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上。因此自然资源和环境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行为的作用。一个区域有良好的资源和环境条件,当然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但这种良好的资源基础和环境条件能否持续利用,则取决于社会行为的得当与否。进一步说,资源和环境条件良好的区域,若没有良好的社会行为,则资源和环境条件也会恶化、退化;变成不可持续利用的状态。反之,一个区域,即使原来的资源和环境条件并不理想,但若有正确的社会决策和良好的社会行为,则不理想的资源状况和环境条件有可能被改造成与可持续发展相合拍的条件。从一定程度上说,在 21 世纪即将到来的时代,自然资源和环境原始状态或条件,很难构成对可持续发展的不可超越的障碍;因为正确的社会战略、发达的科学技术 and 良好的社会行为在当代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完全有可能改变不利的资源条件和不理想的环境状况,创造出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开发模式和环境保护策略。相反,没有正确的发展战略和开发方案,没有良好的社会行为,再好的资源也会很快被剥夺殆尽,再好的环境条件也会被破坏。自然资源和环境对人类的限制、惩罚,是通过人类自身的行为来实现的。在当代,已可以找出一批资源基础不丰环境条件不佳的国家和地区,由于他们在发展过程中,注意对环境的保护和实行资源的节约利用,已基本摆脱资源贫乏的困扰,改变了环境恶化的趋势,走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道路。但在当代,却很难找出一个国家和地区在野蛮开发中还能保持资源丰富状态的例子。

我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着的严重挑战,既有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问题,又有自然环境恶化的问题,更有社会行为与可持续发展背道而驰的问题。表面看来,我国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是资源和环境,实质却是非科学的决策和粗野低劣的社会行为;前者是后者的结果。就是说,我国资源、环境问题严重化、恶化的根子在于社会过程、社会行为的劣根性;

而不在于自然资源和环境本身的性质。进一步说,我国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已是既成事实,靠资源和环境自身已难以逆转;唯一的出路是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规范社会行为,以此来扭转资源短缺的局面和环境恶化的状况,从而达到持续发展的目标。

我国当前存在多方面与可持续发展相悖的种种不良的社会行为

当前,我国存在的与可持续发展不协调的社会行为是多方面的,态势是令人担忧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非科学的决策。持续发展是依据多种科学原理共同总结出来的人类社会发展模式,是一种大科学行为。科学决策,即制定出符合客观规律和社会实际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针和政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在我国,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大量令人失望的情况。

我国是一个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政府对于经济决策的干预依然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特别是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大中型建设项目的立项、论证和建设等,基本上是以政府行为来实现的。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科学决策受到长官意志、部门利益的驱动等影响,不少决策不仅脱离持续发展轨道,而且直接导致建设项目的失败。由此造成大量资金、资源的浪费。据有关报导,40 年来,我国由于投资决策失误,大约浪费 8 000 亿元(不含“三线建设”);据中国建设银行专家估算,仅固定资产投资,40 年来,至少浪费一万亿元,约占固定资产总投资的 50%。1990~1994 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以每年平均 40% 的高速增长,而每年新增固定资产增长率仅 25%。据国家有关部门资料反映,从 80 年代至今,国有资产每年流失 500 多亿元。^①各地许多成为亏损大户的新建大项目,70% 以上都是“首长项目”。

决策失误带来的损失不只是经济上的,更重要的是对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压力,大量财力、物力、土地资源、自然资源损失于决策失误所引来的项目上,归根到底是将宝贵的自然资源断送于无经济价值或负经济价值的行为中,这对于资源本已贫乏的中国来说,是雪上加霜。

从社会行为上看,决策失误在我国已成为一种常见现象,几十年如一日,并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更未将杜绝决策失误作为一项持续发展的硬功加以强化;反而形成失误无所谓,照样当官晋升的社会“传统”。对于建立防止决策失误的机制,更谈不上。因此,可以说,非科学决策已成为我国实施可持

^① 引自“浪费是集约经营的大敌”一文,《科技日报》,1996. 9. 6

续发展的大敌。

2. 部门与地方保护主义。持续发展战略是一种开放的战略,与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和机制是相一致的,它要求实现经济全球化、经济开放化。在这个基础上,按照市场经济法则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即发挥市场力量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是实现集约化经营,建立资源节约型产业体系的基础和保证。但是,在我国对外开放的今天,依然存在着大量的以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为特征的封闭式经济行为。其主要表现是:为了局部和区域的眼前利益,不惜牺牲全局和全国乃至人类利益;制定战略的视野不是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而是本区域或本部门狭隘的资源掠夺和短期利益效应,甚至见利忘义、假冒伪劣、欺诈勒索;排斥外界先进、保护本地落后等等也枚不胜数。这些行为,严重阻碍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健康发展,也严重妨碍资源的优化配置,更谈不上区域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有效实施。地方保护主义是扩大了的小农经济,是封建割据的现代翻版,是我国经济建设长期存在、明知故犯的低水平重复,小而全、中而全、大而全经济结构所形成、维系的社会基础,也是我国经济效益低下、亏损大的症结之一。据统计,至1996年全国乡与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库存量达13 300亿元。产品库存率超过工业生产增长率,全国70%以上的工业企业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库存。这种后果产生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以地方和部门利益为核心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应是其主要祸根。

部门所有、地方保护主义的社会行为,还大量表现在:对有利可图的事,大家抢,互相倾轧、侵占,不择手段;对无利可图或要大家投资的事,你推我却,无人问津。一段公路,在地方管辖与交通部门管辖交叉地段或行政区域衔接管辖地段,往往是“三个和尚没水吃”,宁肯成为断头路、烂糟路,也无人愿过问。一处矿山,可以你开我挖,但挖完后的环境整治却无人问津。国道、省道、高级公路到处是路卡、收费站;高速路高而不速。而省区之间、县城之间的商品封锁、排斥,各种办法层出不穷,并且大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之势。这种社会行为的决策者、实践者,还有什么资格谈论持续发展!

地方保护主义是伪劣产品的保护伞和安乐窝;一切低、劣、假、冒产品的长期存在,并在全国“蔚然成风”,屡禁不止,大都是地方保护的“功劳”。靠伪劣产品的税收肥缺养活地方财政,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保本地之伪劣,抵制外地之真优,使得优质产品被排斥于市场之外,而伪劣产品充斥于市场之中,这是对经济质量的否定和贬值;放任伪劣产品的肆虐,实际上是对宝贵资源的浪费,是对持续发展的逆行。

3. 科技投入的严重不足。21世纪的竞争是科

技和人才的竞争。持续发展的实现依赖于科技进步,降低能耗、物耗和水耗,实现集约、节约经营;同时这也是对付各种突变、病害和环境压力的根本手段,是科学地实施资源优化配置的必要保障。因此,科技的力量、水平,人才的数量、质量,国民的素质,是决定经济竞争能力和决定行为文明、思想文明、环境文明、生态文明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没有高素质的普遍高文化背景的国民,就没有现代的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环境文明;没有强大的科技队伍,强大的科技资源储备、信息储备、人才储备、科技设施条件,就不可能有可持续发展的思维、战略,更不可能有可持续发展的规划、计划、实施方案、实现手段和实践条件。

可惜,对于这个很普遍的原理,并不能在实际的社会决策和社会行为中得到体现。也就是说,我国的科技现状、人才现状、教育现状(特别是义务教育)远远不能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相适应。

我国的科技人才数量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我国每万人的科技人才、大学生数等都低于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而且至今尚有大量的文盲和半文盲。这意味着我国不仅现在的科技教育、人才与可持续发展不相适应,而且预示着未来的科技、人才和教育与可持续发展也不相适应。

更令人担忧的是,至今科技和教育投资严重偏低,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义务教育成为家长尽义务;大量人才流失;大量对文化教育和全民素质提高有意义的图书馆、文化馆、科技馆等处于荒废、半荒废状态,经济速度的极大发展与科技投入的严重脱节日益明显。总的感觉是,科技兴国、兴省、兴市、兴县、兴一切行业至今仍是口号的味道浓于实践的味道。

科技不投入、少投入,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是一种长期的现象,已成为一种决策“传统”。领导换了一届又一届,但却没有哪一届真正在加大科教投入上有大的突破,真正把科教兴国、兴省放在最主要的实际决策的行为上,特别是放在投资的兑现上。

科技、教育的少投入,换来的是决策失误的大浪费,招来的是粗放经营、社会不文明的大损失,导致的是生态破坏、环境退化、经济高成本低效益。谁都承认科教投入是最有效益的投入,但谁也不肯把这方面的投入加大到居于发展中国家的最前列。这是一种极难理解的社会现象、决策“奇观”。归根到底,还是对长期可持续发展、对科教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是官僚主义、短期政绩心态的决策后果。

4. 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障碍。这里不准备重点讨论我国环境污染和自然生态的脆弱背景与破坏的严重局面,而主要从社会意识和社会行为角度,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可以说,我国全民环境意识的薄弱和环境行为与持续发展的不协调,是导致我国环境质量恶化的主要原因。

环境意识薄弱包括决策者对环境意义的认识不足,对保护环境不力,对环境投入不足,大量存在重经济、轻环境;重眼前,轻长远;重自身利益、轻环境公共利益的决策思维,导致全国的环境保护欠债巨大。不仅全国环境污染恶化的趋势得不到有效抑制(更谈不上明显改善),自然生态的破坏也日趋严重,自然灾害的频率、损害程度日益加剧。可惜,至今对于这种严峻形势,虽然各级决策者和产业管理部门已有不同程度认识,但真正在行动上痛下决心进行治理的尚不多。一般只有到了环境状况已处于崩溃的时候(如淮河、太湖、滇池水污染等)才下决心治理,这种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因此,在相当长时间里,起码在 21 世纪头 20~30 年,我国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将是环境问题的困扰。

环境意识的薄弱还表现在全民缺乏爱护环境、珍视环境、维护环境的自觉性上。随处丢弃污染物,垃圾沿江、沿街、沿城随处堆放,将大江、大海当成天然纳污池是普遍现象;而滥挖乱垦、破坏森林,也屡禁不止。我国作为世界人口头等大国,人口对环境的压力已举世无匹,再叠加上低素质的人为破坏,所形成的对环境的巨大冲击性,已成为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

改革决策机制,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 共同构成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保障

要规范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行为,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且有可能是一个艰巨而带有阵痛的过程。因此,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实践这个过程艰巨性,不能急于求成,不能寄希望于一蹴而就,要有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另一方面又不能以其长期性、艰巨性为借口,有意推迟、推却、推诿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历史责任和自身的义务。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从现在做起,从各行各业、各区域做起,从每个人作起,并持之以恒,贯彻到底。

在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和阻力,这是由于我国长期形成的决策机制、我国现在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的特点、我国国民素质

低等因素共同决定的。尽管,可持续发展战略已被确定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方针,但真正体现、落实仍然很困难。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可以分成几个层次来讨论。

从根本上说,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建设要搞好,一是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二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决策机制与体系、管理机制与体系、监督机制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可持续发展是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的统一。生态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有赖于人类对于人一地关系的正确认识,有赖于对生态系统的深刻理解,有赖于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反思和对未来人类生态学发展的洞察,这些都是建立在当代众多自然科学、社会和人文科学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的。要将生态文明变成全民行动,虽不要求每个人都成为生态学家、社会学家、环境科学家,但普遍的科学原理是应该懂得的。而这就要有一定的科学、文化基础作背景。只有全民普遍受到良好的教育,文化层次逐步提高,才能比较容易地接受持续发展的观念,形成自觉的行动。

提高全民教育水平,普及高中义务教育,加大受职业教育人员比例,是提高生态文明的根本,舍此别无他法,这是我国需要下大决心,大补特补的一项基本功、基础课。

同时对多年形成的长官决策、人大于法、长官意志的决策机制必须进行彻底改造,建立新的机制与科学体系,建立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管理体制和监督体系。这是根本的制度保证、组织保证。舍此,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建设中的重大失误问题,更无从规范可持续发展的行动和行为。

上述两者中一个是社会基础,一个是上层建筑,两者相互影响,共同构成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保障。显然这两者都不是短期内就能实现的;但这是“根本”,“根本”就应该抓住不放,重点加以培植、建立,缩短与理想状态的距离。应该看到,虽然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和建立科学决策体制、管理体制需要长期努力,但每在这些方面取得进步,就是对可持续发展的一次推进。我们应该持久不懈地朝这个方向努力,并尽可能加大力度,加快步伐。

(责任编辑 王宏章)

(上接第 17 页)

情、省情、区情和农情出发,建立适合当地实际的农协组织,突出自己的特色。

参考文献

[1]王青,21 世纪: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瞻望,农业现代化研究,1995. 3

[2]黄映梅等,论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战略地位与历史作用,农业经济问题,1996. 6

[3]潘劲,试论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产生与发展条件,农业经济问题,1996. 11

(责任编辑 王宏章)